

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及其价值意蕴

张云婷, 方世南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现代性的发展使生命政治这一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关键词发展成全球政治最大的时代问题之一。作为社会批判鼻祖的马克思主义内蕴着深刻的生命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充分透视了资本对生命在肉体、精神、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权利等方面的控制, 构建出了以生命解放为问题意识、以确保每个生命的自由全面发展为逻辑起点、以建构新型国家的公共伦理导向为逻辑中介、以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为应然旨归的生命政治逻辑。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以批判和建构的辩证视域描绘了实现生命安全的人类解放图景, 这对深入理解、把握和有效应对当今愈加凸显的生命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生命政治; 主体; 资本; 生态;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22) 1-0001-09

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度批判, 生命政治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新维度。但正如阿甘本所言, “生命政治最初就已镶嵌在人类共同体之结构当中”,^{[1](P22)} 也就是这一思想的出场应该在深远的脉络中审视其深刻内涵。生命政治在社会批判鼻祖的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源头失语。马克思确立“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探讨了现实的个人与社会、自然间的关系, 充分透视了资本对现实的个人生命的控制。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着眼于现实性的政治筹划, 从生命受到权力压制与生命蕴含的生产力量两个对立的矛盾性范畴阐发生命政治, 构建出了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 以“生命解放”为问题意识的生命政治逻辑的生命形式。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在资本权力批判中开启了生命政治面向的转向, 为当代的资本权力批判奠定了内涵逻辑, 确立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对深入理解、把握和有效应对当今愈加凸显的生命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的出场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深刻揭示了人的生命本质。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发端于生命哲学思想, 确切地说是人的哲学思想, 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启蒙现代性使生命理性得以高扬, 但随之而来的是形式理性渐渐强大, 生命本身被控制。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扬弃了伊壁鸠鲁哲学的反神学思想, 排斥掉了对神的崇拜, 肯定了生命存在价值。其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他鲜明指出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 通过对宗教的批判破除了“偶像”的束缚, 彰显了人的主体性, 并使这一主体性体现于生命活动之中。生命政治哲学以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形态首次出场, 此时的出场形态融贯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批判中, 同时夹杂着异化劳动对无产阶级生命的压榨。正如马克思的两次转向一样, 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在 1845 年之后,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 以与资产阶级现实社会关系“联姻”的市民社会为基点, 从生产逻辑与资本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07)

作者简介: 张云婷(1993—), 女, 山西晋城人,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

方世南(1954—), 男, 江苏张家港人,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和生态文明研究。

逻辑的二重性视角出发,确立“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探讨了“现实的个人”与社会、自然间的关系,通过对资本权力批判的政治经济批判形态出场,充分透视了资本对现实的个人生命的控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家对工人人身的支配与控制

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对人的生命的压榨和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他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内部的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2](P3)} 资本家在工厂内形成一套微观权力体系,不仅实现了对生物性生命的控制,而且也对社会性生命实施全面控制。为了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兵营式的纪律”来无限延长工作日,“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2](P306)} 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约束,重复性劳动在工人的精神层面进行剥夺,工人被同质化为机器运转的环节,根本没有自由劳动时间去开展社会性实践和充盈精神世界,工作成为唯一的交往方式,“活劳动”变成“死劳动”。资本家通过精细而严格的生产任务、生产时间表、罚款制度、责任制度等监督工人劳动,以直接作用于工人肉体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帮伙制度使工人的妻儿也被抛到资本的车轮下,妇女在分娩前因担心位置被别人占去而不停歇地站着工作 13 个小时以上,诞下小孩后又要忙不迭地外出工作,无暇顾及小孩,小孩因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率较高。恩格斯说“工人的孩子有 57% 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2](P420)} 活下来的小孩也要进入童工行列,发育缓慢,且素质低下。这种突破“纯粹身体的极限”造成工人在制造业情境下各种生命基质的衰减,“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了”。^{[3](P453)} 此外,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反复出现,这些工人成为规训现役就业工人的一个杠杆,与现役产业军“相互残杀”“人与人为敌”,他们极易发展成贫困人口,加剧贫困的代际传递。

资本积累、市场扩展和资本危机的一次次爆发使资产阶级对生命的态度由暴力掠夺转向扶持,以求降低人口所面对的风险。不过这种

扶持仍是种最大限度压榨生命“生”的价值性的粗暴扶持,也就是“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后代人不至死绝”。^{[2](P171)} 资本的扩张性决定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榨和粗暴扶持也是跨界域的。资产阶级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到了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地采用暴力的方式开发殖民地,如借口“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致使“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人权横遭侵犯”,^{[3](P620)} 工人生命受到的压迫更甚,变成非存在的存在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关于资本家对工人压迫的论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资本对人的多重生命属性的剥夺,鲜明地指出了资本压榨下工人生存状况的窘迫。

(二) 生态环境恶化对生命自然生产的影响

生命的生产包括“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2](P532)} 前一种生产是人的社会生产,后一种生产是人类的自然代谢生产,两种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都来源于自然界。自然对人类而言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先在性,直接影响着生命的自然生产。资本逻辑决定了高消耗、高消费和高污染的带有生态原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和自然都采取极端剥削压榨做法,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被破坏。资产阶级从大自然肆意摄取原材料,“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3](P36)} 耕地、森林、矿产等减少,土地肥力下降。具体生产过程中工种的差异以及对原料和废弃物的不当利用会造成二次污染,如工作环境中的粉尘、瓦斯、噪声、纤维屑等。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化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4](P579)} 也就是资本对自然的破坏直接作用在工人和无产阶级身上。恩格斯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造成的影响。他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就提到工业生产中因使用土耳其红颜料而对河流造成污染,影响居民饮用水,也论及了工人们工作环境中吸入的煤烟粉尘等对工人健康的损害。随后的生态调查和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扩张导致的“日益腐败的自然界”的表现,具体分析了工人阶级面对的环境状况:遮天蔽日的煤

烟笼罩着城市,垃圾、废弃物堆积,空气中恶臭难耐,城市空气质量急剧下降;生产和生活垃圾被直接排入河流中,清澈的河水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空气污染引发的酸雨、煤烟产生的黑气和排污导致的黑水影响了动植物的自然生长,环境公害频发。工人被排挤在“乌鸦窝”的地方,“地狱”般的居住环境加之自然环境的恶化,催生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恩格斯就曾感慨,在那种情况下这一最贫穷的阶级根本无法健康长寿。无产阶级丧失了最基本的生态权益,人口总数下降。

资产阶级对乡村的臣服性统治使农民失去诸如土地、森林等自然共同性的基础,变成除生命自身以外一无所有的生态难民。资本家则将天然的公共资源转化为私有,享受着环境特权。部分农民在被迫加入无产阶级队伍或是被迫吸纳进工厂后,被再次剥夺生态权益,陷入“文明的阴沟”中,成为一个受到普遍污染的阶级。如果批判到此就结束,不足以表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智慧。他们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拉响生态警报,提出了“大自然的报复”论,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整个人类的生命都将受到胁迫,资产阶级也必将自食生态恶果。

(三) 国家机器对生命的隐秘压制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P571)}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将人们在虚假共同体中的物化逻辑从经济生活领域自然而然运演到上层建筑领域,揭示了工人的生命生活在狭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变成一种虚假的权利形式。资本家通过资产阶级权力的奴仆——法律,将人权这一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转换为本阶级的特权,法律与资本家的策略互为唱和,表现在选举、公共卫生和教育三个与生命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

在选举上,工人先是受到自有资产阶级的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而后力争所勉强得到的“施舍”不过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4](P156)} 即便是这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及妇女因选举权门槛的阻隔依旧无法参与公共生活,被统治阶级处于失语状态。

在公共卫生服务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

卷中大量引用《公共卫生 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并指出“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藏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4](P455)} 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府对恶化的公共卫生治理的失效。无产者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和救济,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的疾病不胜枚举,工人对健康权的诉求流于虚妄。工厂主和承租人受到制度庇护,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工人置于城市中边缘阴暗地带,“工人住宅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4](P788)} 直到1848年6月英国的《公共卫生法案》问世,1860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普遍化,公共卫生问题才渐渐被重视,但工厂法的扩充条例又作了大量的例外规定和对资本家的妥协,工厂管理法的各项细节也十分贫乏。

在教育方面,随着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与反抗,以及未成年教育水平低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掣肘,资产阶级政府介入公共教育工作,如开设工厂学校、发展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和职业学校、创设半工半读学制等,将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并将此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很显然,这种情况下工人所接受到的教育更偏向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技艺教育,不是全面发展的教育。儿童接受的所谓义务教育也缺乏配套保障,监察和惩治措施不够,入学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教育的培养场域被资本控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2](P48)} 这道出了资产阶级国家教育的本性。

二、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要想实现现实世界的真正革命,需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科学方法论。马克思的批判标准不是抽象的“应然性”,而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能够实现必然性的标准。相应地,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出场,也自觉地将批判性解构与建设性建构辩证地统一起来,构建出了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以“生命解放”为问题意识的生命政

治逻辑的生命形式。这一思想从生命受到权力压制与生命蕴含的生产力量两个对立的矛盾性范畴阐发生命政治,无产阶级被赋予新政治主体的权力,完成了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解,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统一,最终走向人的全面发展。

(一) 主体回归: 确保每个生命的自由全面发展

生命政治并不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一不平等正是借由“劳动力商品化”中商品的平等交换原则,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形成的社会结构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合法”介入来完成的。马克思提到离开简单流通领域或是商品交换领域,剧中人的生命起了某些变化,“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蹂”。^{[4](P205)} 人的生命从表面上被分割成资产阶级的享受性生命和无产阶级的压迫性生命等对立的形式状态,但实际上“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2](P261)} 无产阶级以一种“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的自由的方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以一种甘当资本奴隶的自由的方式获取他人的劳动力。不管是哪一种,人的感性生命都被抽象掉,人的生活变得不真实。马克思从生命主体视域出发,强调生命的“在场性”,辨析了生命的自然属性和超自然性属性,论述了超出纯粹生命的最终使主体成为主体的那部分必要条件,从生存论角度肯定作为肉身的生命的实体存在的重要性,批判了资产阶级对健康生命的损害,认为生命发展的必要前提是生命健康。继而从发展论角度揭示了作为社会性的生命的全面发展,批判了资产阶级对生命多维发展的压榨,认为生命通过价值追求实现尊严,并将问题聚焦于阶级,提出要实现从资本主体性向无产阶级主体性的翻转,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力量创生出各种社会关系,实现每个生命具有最高完满性的自由个性,在生命的超越性及生命所获得的解放的程度和生命的丰富性及生命所获得的解放的广度上提供人类生活最高的善的价值导向。

对生命主体性的回归是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完成了主体性的一次重要视域转化,他先是从认识论上开辟了不同于形而上学关于人的存在

方式的路向,然后深入人存在的根基,真正从生命的意义上理解自由。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的个人,“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2](P520)} 生命的存在方式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既受制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有自然生命的“自在性”,又包含了超越自然生命的其他存在,也就是类存在。马克思提到,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这一类存在物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有意识的自主活动,人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真正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质,在认识自身生命关系的必然性中获得自由,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正是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的生命活动不仅仅满足于维持最低生命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也有“有意识的存在物”这一生命体特征在与物、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各种活动中所生发的各种需要,也就是生命要发展除了生存性需要必定要有社会需要。生命也有物质性、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生态性等形态,构成人的多维度的意义世界。马克思在这一层面上强化了生命意识,丰富了他的生命观,认为人的生命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条件下有多样的价值追求。他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抨击、对无产阶级各种权益的呼吁等,正是为生命尊严的呐喊;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追求也是因为这种劳动是生命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能够真正占有自身生命本质,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能力和生命存在本身蕴含的内在潜能。

马克思揭示了价值规律内涵剥削规律的事实,指出“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5](P253)} 自由自觉的劳动被并入资本,一开始厘清的人的生命的主体性在历史中具体化为“阶级”主体性思想。破除资本这一“普照的光”,唯有在历史本身的辩证运动中,发挥生命主体性。无产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2](P542)} 正是这一“例外状态”承担着“武器的批判”作用。在每个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个体发展的自由度和全面性不断得到提升的境遇下,人的生命活动不再受外界控制,个人能够保持其独特的个性与自尊,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来占有自己不断生成的全面的本质。

（二）关系共生：实现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存在和原始关联,从自然与人有着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界定上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互动和共存共生共荣,这也是理解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间关系的重要理论视域。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着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影响着人类生活质量和整体安全。马克思指出,“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161)}生命的肉体活动、精神生活和生产活动依靠自然界,自然为生命提供生存空间,提供了支撑人类生命的重要部分,是生命体生存和发展的母体。自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提供了阳光、空气、林木、水源等)、生产资料(煤、石油等)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以土地为例,“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5](P466)}土地是构成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没有土地,生命就无法生存。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存在,而是处于不断的物质变化过程中的现实自然,这一物质变换是由人来完成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具有优先地位的外部自然界长期进化演变出有生命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出现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实现统一。

生命与生态发生作用、反作用关系的另一极意蕴就是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对生态环境的作用。“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6](P559)}但随着狭隘的自然关系被打破,人们在对自然的占有中产生将自然下降为有用物的错误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批驳了瓦格纳从抽象的人出发,以抽象的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衡量物的价值的立论基点,认为将自然界看作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价值的做法无形中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将人的价值放大,弱化甚至否定自然价值。这极易导致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滋生,人类在对自然无节制的攫取中致使自然本身的调养能力和供给能力失衡,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长此以往,代内与代

际、近期与长期矛盾突出,人类生命的真正价值难以得到彰显。正是因为有对自由和必然正确认识把握的理性,人类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去支配自然界,而是融于自然之中,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以一体之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支配我们自己 and 外部自然。只有在顺应自然、尊重规律、敬畏生命的价值理念下,自然生态与生命之间双向创造多种互动有益的价值,并且在互惠实践中不断促进彼此价值的保值增值,形成生态健康与生命健康的同构关系,唯此才能实现生命的永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从新陈代谢与物质变换原理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规律、从生态经济学视角论析和谐的社会有机体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政治发规律透析关系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政治社会问题等,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阐明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一致性,揭示了人与自然在能动自主的实践中完成了的本质的有机统一。“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P120)}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交换”。^{[7](P928)}此时社会不再以异化和私有劳动为基础,自由劳动和公有制介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对纯粹的自然主义和纯粹的人道主义扬弃,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统一,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解决。人不再以一种攫取和压榨的心态看待自然,而是正确面对和科学预见自身行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以能动的实践满足自身需要。人能够带着对美的感悟发自内心地欣赏自然、发现自然,捕捉到“对象的存在”,并且在实践活动中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融洽共存、和谐共生。生命在与自然、社会共生的关系下,掌握了美的规律,实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形成与自然、社会共生存同发展的生命统一体。

（三）权力自省：建构新型国家的公共伦理导向

生命政治总是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现实社会生活需要在一个空间场域下展开,国家正是一段时间内生命与政治结合从而实践形成的场域。马克思赋予了国家政治共同体

的身份,认为国家是“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2](P32)} 这一定位突出了国家在功能和实质之间的张力,即国家虽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作为公共权力的设立,它也承担着管理全社会共同事务方面的公共职能。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国家既要对国民提出义务要求,也必须维护国民权利。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就列举了亚洲政府具有举办公共服务的职能,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更是具备执行管理全社会共同事务的职能。从国家的生成逻辑来看,它是社会在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时,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相抗中共同利益“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P536)} 而形成的。国家通过其所具有的合乎生命生存和发展的理念的具体化,提供一种使生命通往美好生活的共同体场域。这一共同体场域下的政治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8](P181)} 虽然这些权利范围没有超出利己的人,与真正的共同体下对生命权利的保护还有差距,但它至少体现出一种共同体意义上的生活,推动向真正理性共同体的递进。就国家对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而言,国家不仅影响着单个具体生命的生存样态,更调控着生命的量的集合体——人口的数量。因为“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国家的现实基础……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8](P377-378)} 要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要对基于社会性本质的集群性生命进行调节,关注影响出生率、死亡率、健康水平和寿命等因素的变化。如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效控制传染病和各类疾病,为本国的每个人制定能够保证增加生存机会的各种政策等,发挥国家扶持、保护等调节或“投资”生命的权力。不管是生物性生命、社会性生命抑或是其他哪一种生命形态,在未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都要在国家场域下,借由国家的安全配置得到演化发展,这是对国家关于生命保护功用的客观性述说。

对现代国家关于生命保护功用的述说正是基于国家阶级性特质的逻辑展开。由于国家的阶级性特质,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需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对生命权利保障的作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无产阶级尚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权,但

马克思十分重视在国家治理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现代无产阶级将解放世界的事业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组织团结各方力量,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在不间断的革命中将国家政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9](P588)} 并且从权力设置上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如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系列构想等,这些理念原则从根本上保障和发展生命权,建构和确立新型国家的一切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公共伦理导向,在最大程度上捍卫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这样一种明确的伦理价值目标,强化了国家治理的目的性,确保了分配正义能够得到充分维护。国家管理治理中的一项重要价值目标就是维护分配正义,生命从实体角度来讲,是分配这一抽象概念得以落实的实体承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状态中,无产阶级政党能最大限度保证分配正义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在一致性,人民的物质财富、发展机会以及思想观念等资源能够得到较为公正的分配。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正确运用宏观政治权力,高度重视资产阶级日常意识形态渗透的微观权力,将国家和国家权力作为手段,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在通往真正共同体的过渡形式中,生产关系渐趋平等合作、社会关系渐趋和谐无私,无产阶级渐渐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人与社会关系呈现良性互动,人民主权得到保障,生命形式不再受束缚,人们共享生命成果和生命实质,进而整个类生命得到逐步解放发展。

(四) 形态自觉: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

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也应当是思想的逻辑终点,马克思并不局限于国家对生命的治理实践,而是在根本上关切生命的生存样态,关注人类解放。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回路,确保每个生命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逻辑起点,实现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建构新型国家的公共伦理导向是逻辑中介,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则是在批判人的生命“实然”状态后的“应然”旨归。

现实的人基于共同利益形成一种关系模式,

即共同体,共同体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的生命之间共在状态的反映。现实的人又是从事一定生产关系的个人,形成的“共同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P533)} 共同体的变化也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马克思的“三形态说”为思考人的存在方式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三形态说”呈现了实体大我下人的生命的依附性、单子式小我下对物的依赖性的生命的独立性和普遍类存在下人的生命的自由性三种不同的生命存在形式。

商品交换关系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共同体存在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这一共同体中劳动和所有权具有同一性,个人与共同体也具有同一性。个人生命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生命存在于神权、封建政权范围内,肉体被随意征用和惩戒。生命生活和精神信仰等被囊括进共同体的价值结构中,依托于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单个生命缺乏对自身认可的自我意识,生命意义由群体、上帝、城邦等赋予,也就是只有在特定关系中,如在封建的和行会的等传统关系下才能彰显个人生命。货币共同体存在于第二阶段,“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5](P178)} 在这一共同体内,传统的自然共同体被破坏,劳动和所有权分离,基于宗教、血缘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解体,人只以商品所有者身份进行自由地交换。一旦脱离这一语境,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的二律背反使一个外在的、偶然的经济联系与独立的个人主体相对立而存在,生命存在的悖论显现出来。此时权力对生命的态度由人的依赖性关系域内的暴力剥夺渐渐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的隐秘掠夺,生命的创造性、独立性和能动性被湮没,类生命无法得到应有发展。真正的共同体存在于第三阶段,“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P571)} 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公权力失去压迫性,个人与共同体、特殊与普遍之间消除了异化与对立关系,公共精神恢复,生命呈现完全的自由形态。

真正的共同体是一种真正的人类关系,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类本质的目标,完成类解放。“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

社会的人类”,^{[2](P502)} 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命运的关于人类普遍性意义的主张及思想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克服狭隘的阶级性,以人类性思维意识在改造现存世界的活动中形成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以世界历史发展为基础,世界历史在发展进程中,“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8](P42)} 人类社会交往日益普遍化,真正的共同体得以实现。这一共同体正是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个人形成的联合体,它并不会以“同一性”否定人类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而是否定狭隘的民族性所造成的逆世界性的观念与实践;也不会否定个人及个人生命的个性,而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P46)} 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从共同体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客观自由和主观自由。人的社会性真正实现,个人向“类主体”提升,以“类价值”为指导准则,形成“类本位”,实现“类安全”,从片面的自我中心中走出来,向自然、社会和世界开放,生命的双重属性得以确立。

三、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围绕生命自由、生命健康、生命安全、生命解放四个关键词进行省察,以批判和建构并进的二维进路呈现它自身的积极内涵。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把握和有效应对当今愈加凸显的生命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更积极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哲学思想的伟大出场。

(一) 树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哲学的学术自信

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几次大屠杀、当代生命科技的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频频告急、网络虚拟世界导致的生命的“去实体化”、数字化对生命的控制、资产阶级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对生命价值导向的规训、生命生活的日益符号化等不断引发人们对生命政治的思考。日趋激烈的意识形态论争和思想文化交锋使得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价值在对生命的控制和争夺方面不断角逐,资本权力的布展越来越隐秘,对生命的控制更加精细化,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凸现出来。时代的发展在提出新问题的同时,也展现出

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所蕴含的新的意义,也就是会产生相应的理论、结构和范式。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提到“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生命政治哲学思想以一定的批判的方式介入社会现实,阐发了一系列关于生命原初、生命何以受制、生命何以安置的思考,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生命政治的新发展。但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路径和建构上的片面性一样,西方生命政治哲学却多诉诸后现代思维批判。福柯等人提出的生命政治治理将生命当作对象,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跳脱出了“现实人”的基点,缺乏整体观感,抛却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当代中国生命政治哲学以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为方法论指引,不仅是在与西方左翼思想对话中对生命解放之问的解答,更是在不断的比较、释疑中始终保持自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对现实生命问题揭示的预判性、对生命矛盾批判的深刻性、对生命未来价值把握的科学性确立了生命政治主体,明晰生命政治哲学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到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完整逻辑的理论范式,树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哲学的学术自信,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二) 提升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效能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世界中,现代权力的运作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阿甘本定义的赤裸生命,还是福柯定义的生物式存在,都表明现代性的巨大进步给生命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生命也承受着更深层次的生存窘境。权力对生命本身建构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生命在现代性的诸多关系博弈中被政治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这些都与福柯的断言相吻合:今天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生命。权力对生命的介入越深刻,现代国家越需要以一种内在的整体化进程发挥正面的对生命积极建构的功能,从对抗与冲突中转向和解。如哈特、奈格里所言,国家“必须一刻不停地在广泛范围内完成把个人纳入总体,把所有人的意志凝结成一种普遍意志的奇迹”。^{[10](P106)}这至少指出了一个方向,即应该关注生命相关,如有关安全、健康、权利、自由等涉及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并且要以一种非线性思维着眼于国家场域下生命的现实状况,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中首先需要集科学与价值于一体

的治理理念。理念作为观念的理念性提升,是实践活动的指导和先导,理念的清晰性和科学性对于实践方式至关重要。治理理念是国家共同体重要精神免疫系统,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思想孕生了生命政治治理理念。生命政治治理理念是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在对人民生命安全、生命健康等关乎生命生存和发展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以及在这一治理价值导向支配下所衍生的相关行为和制度等。这是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的本质核心,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的首要内容。因为生命安全和生命健康是人民的首要利益,也是最根本的底线利益,是其他所有的利益,诸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等的前提,没有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以脱贫攻坚为抓手的贫困治理不仅是对共享理念的贯彻,也是对生命政治治理理念的贯彻落实。如果不消除贫困、解决温饱、改善民生,很有可能因贫致病,甚至使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解决好贫困问题才能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一阶段奋进。以这一理念为指引,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有效提升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效能,夯实了国家安全基石。

(三) 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生命—生态安全一体化进程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规定性,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持续蔓延的时代,人类面临的危机呈现一种复杂交织、多样性联动的复合性危机,人类生存依赖性日益紧密,人类命运息息相关。2020年初突如其来疯狂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一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卫生事件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常互动,揭露了生命危机和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中的如影随形。由于人的生命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支撑,所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构成一个最为核心本质的安全共同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正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建构的重要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构建具有强烈的价值色彩,反映了人类多方面的价值诉求和目标,而价值问题说到底利益问题,要保障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自然的生态安

全,构建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体系,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多方利益。马克思针对 19 世纪 50 年代肆虐在欧洲的霍乱疫情,发表了系列评论,提到“如果我同意瓦尔卡尔特先生的看法的话,我就要说,霍乱是被沙皇派到英国来执行一项消灭最后一点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秘密使命’的”。^[11](P369)]他以一种暗讽的语气,批评了一些政治狂热分子被偏见遮蔽,置人类灾难于不顾的愚昧行径。中西方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上也体现了利益导向的差异。西方左翼思想家指出,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假象,阶层、地区等的区隔以及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被病毒感染的随机性所遮盖,他们再次将病毒阴影下的多种议题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现代性的抨击。在看待和对待新冠肺炎疫情上,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的对照表明,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理念正是从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生命利益出发,不仅确保人类之“命”这一本在的安全健康,也确保影响“命”的生态环境的安全健康,保障全人类生命安全,致力于形成为人

类更加安全和更加高质量地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牵头,构建一个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实现全球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生命—生态一体化的合作治理,使全人类持续不断地获得利益和享受利益,最终形成围绕生命—生态权益的最具有普适性、均等性、公正性的全人类利益。

[参考文献]

- [1] 阿甘本.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M]. 吴冠军,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10]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M].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Marx's Bio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Value Implication

Zhang Yunting, Fang Shinan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has made biopolitics, a key word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develop into one of the biggest contemporary issues in global politics. As the originator of social criticism, Marxism contain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biopolitics. Marx fully analyzed the capital's control over life in the aspects of body, spiri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ights. He constructed the life political logic which takes the liberation of life as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ensure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very lif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nstructs the public ethics orientation of the new country as the logical medium, and takes the social form of the union of free people as the purport. Marx's philosophy of biopolitics depicts the vision of human liberation to realize life safety with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f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 understanding, grasp and effective response to today'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iopolitical issues.

Key words: biopolitics; main body; capital; ecology; community

(责任编辑: 李 官)